

# 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市场 准入对就业的影响

张恒瑞, 吕康银, 陈思

(东北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7)

**摘要:** 稳定就业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夯实民生之本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背景, 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为切入点, 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 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了该制度对企业稳就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能扩大了企业员工雇佣规模, 起到了稳就业的政策效果。该制度分别通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这三条传导路径来扩大企业员工雇佣规模。异质性分析发现, 该制度的效果在东部地区、低技术行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国有企业中更加突出。本文建议深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以实现更均衡、高质量的稳就业目标。

**关键词:**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员工雇佣规模; 稳就业; 全国统一大市场

**中图分类号:** F24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700 (2026) 01-0075-13

## 一、问题提出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在此背景下, 如何完善稳就业与稳经济的政策工具箱, 特别是深化市场化制度改革举措, 以推动就业稳定, 成为目前学术界和政府有关部门关注的重点。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其定位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重要抓手, 旨在破除行政壁垒与地方垄断, 推动生产要素与商品服务自由流动, 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通过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能够有效驱动产业结构升级, 为实现稳就业目标创造有利环境。202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发改体改〔2024〕1742号)进一步明确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实施措施。其中实施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被置于首位, 强调通过大幅缩减政府审批范围, 明确市场准入禁区, 减少行政干预,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提升市场准入便利度, 对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具有积极影响, 为实现稳就业目标提供支撑。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推进具有清晰的政策脉络, 是全面落地且逐步深化的系统性改革(见表1)。

收稿期间: 2025-06-18; 修回时间: 2025-10-2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数据要素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机制与实践路径”(24YJAZH103); 吉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基于劳动力市场新变化的大学生就业价值观研究”(JJKH20250243BS)

作者简介: 张恒瑞, 东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吕康银, 东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陈思, 东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印发《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发改经体〔2016〕442号),率先在天津市、上海市、福建省、广东省开展试点,开展了以清单式管理为代表的市场化改革探索;2017年,试点范围扩展至浙江省、重庆市、湖南省等11个省份,进一步积累了区域实践经验;2018年《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年版)》正式发布,标志着该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港澳台除外)全面实施,实现了市场准入规则的统一化与规范化;此后相关政策持续优化,通过动态调整清单内容,强化执行监督作用,不断破除隐形准入壁垒,为市场主体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这一系列政策部署,既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筑牢了制度基础,也为市场化改革的稳就业效应提供了准自然实验场景。

表1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实施过程

出台时间	政策文件	相关内容
2016年4月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	首次提出清单式市场准入管理,在天津、上海、福建、广东开展试点
2017年11月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2017年版)	将试点区域扩大至浙江、重庆、湖南等11个省份,积累多区域实践经验
2018年12月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年版)》	全国(港澳台除外)正式全面实施,明确市场准入规则统一化要求
2024年12月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	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列为首要实施措施,强化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协同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政府网。

既有相关研究关注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微观效应。例如,在企业战略发展层面的供给侧去产能、改善政企关系、缓解产能过剩<sup>[1]</sup>、通过市场竞争效应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sup>[2]</sup>,在规范公司治理层面的抑制企业投资金融化和避免企业脱实向虚<sup>[3]</sup>,在优化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层面的促进人力资本结构升级<sup>[4]</sup>,在促进企业内部共同富裕层面的增强企业劳动收入份额<sup>[5]</sup>。在企业稳就业方面,现有文献多从宏观政策评估(如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sup>[6]</sup>,或微观企业行为(如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减税激励、供应链溢出等)视角展开<sup>[7]</sup>。已有研究虽证实了政府政策与企业行为对稳就业的作用,但较少聚焦市场准入放宽这一市场化改革举措,且忽视了其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协同效应。目前,关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就业效应的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市场准入管制放松本身<sup>[8]</sup>。

本文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重点分析该制度通过破除地方市场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对企业雇佣决策的间接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2016年起实施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作为准自然实验,旨在揭示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背景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企业稳就业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系统考察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作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措施对企业稳就业的影响,并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验证了结论的可靠性。第二,重点揭示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如何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增加研发投入强度以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这三条传导路径实现稳就业目标。第三,从区域、行业、企业等多维度进行异质性分析,揭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稳就业效应在不同类型企业中存在的差异,为理解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雇佣规模的影响提供新视角,为政府精准施策提供政策依据。

## 二、文献综述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稳就业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点关注。

第一,关于企业稳就业的相关研究。稳就业作为政府经济调控的核心目标,其实践效果是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现有研究主要从宏观政策和微观企业行为两个方向展开。在宏观政策层面,相关文献从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如智慧城市建设和城市数字基础建设出发,认为政策能够有效刺激总经济需求,

从而带动就业规模的增长<sup>[9]</sup>。近年来,政策工具相关研究逐渐增多,如碳排放交易在提升企业劳动力需求水平的同时显著提升区域的就业水平,并有效推动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sup>[10]</sup>。宏观政策研究为理解政策的整体实施效果提供了基础,但对政策如何传导至微观企业层面,影响其雇佣决策的内在机制仍分析不足。在微观企业行为层面,学者关注到企业的自身战略选择和行为如何影响企业员工雇佣规模。一方面是企业科技创新,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能够提升企业就业水平,通过提升企业竞争力来改善就业结构和增加就业稳定性<sup>[11]</sup>。另一方面是企业参与供应链金融,企业作为融资方参与供应链金融能提升企业的劳动雇佣规模,增加低技能劳动力占比,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sup>[12]</sup>。微观企业行为相关研究深化了对企业稳就业的理解,但较少从市场化改革的角度来考察,忽略了降低交易成本和激发创新活力对企业稳就业的作用。

第二,关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相关研究。主要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内涵与经济效应的视角出发,学术界普遍认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制度规则、要素资源、商品服务的统一,同时通过制定反不正当竞争法来避免不正当市场竞争进而推进市场规范化。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核心经济效应包括扩大市场范围、深化分工、降低成本的规模效应,打破行政垄断和企业经济垄断的竞争效应、推动资源和要素自由流动的资源配置优化效应。上述效应将共同促进城市经济效率提升并加快区域产业结构升级<sup>[13]</sup>。目前关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宏观层面分析较为充分,但政策对微观企业层面的作用路径,尤其是如何影响企业劳动雇佣决策仍需深入研究。也有学者研究认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能够有效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并显著提升就业水平,同时也推动了劳动力市场规模的增加<sup>[14]</sup>。目前关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如何影响企业稳就业层面的研究仍有待深入,其内在的传导机制存在一定的研究缺口。

第三,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经济效应研究。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作为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改革,其经济效应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在企业战略决策层面,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提升了市场的公平性,能有效打破地区的市场壁垒,进而促进企业进行跨地区投资<sup>[15]</sup>。在企业生产效率层面,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能够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具体而言是以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和推动企业人力资本升级的路径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sup>[16]</sup>。在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层面,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实施能够提升属于准入行业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同时,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以加快产品市场竞争的路径增加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有助于企业实现共同富裕目标<sup>[17]</sup>。已有研究关注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就业的直接效应,但从企业稳就业视角出发的相关研究仍然较少<sup>[18]</sup>。虽然相关研究指出了其在企业战略决策、治理优化、收入分配层面所发挥的作用,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否能通过增强企业竞争力和加大企业创新投入的传导路径来推动企业实现稳就业的目标尚未得到系统性验证和明确阐明。

本文围绕三个关键问题展开研究。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在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能否促进企业稳就业?现有研究多关注制度本身的就业效应,未结合统一大市场中要素自由流动的特征并避免低估长期效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通过哪些传导机制影响企业稳就业?本文提出的数字化转型、研发投入强度提升、融资约束缓解三条路径需要检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稳就业效应,在不同区域、行业与企业类型中是否存在异质性?现有研究仅部分覆盖要素密集度和市场分割程度等维度,本文将系统分析要素禀赋差异和劳动力需求结构差异并为精准施策提供依据。

因此,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拓展相关研究。第一,聚焦于国家核心制度安排,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这一制度安排作为切入点。第二,确定微观研究目标,直接考察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企业层面稳就业存在何种因果效应。第三,分析具体传导机制,重点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缓解融资约束这三条传导机制,阐明该制度如何通过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来实现稳就业目标。第四,系统性分析政策效果在不同区域、行业、企业的异质性作用,为政府精准施策提供依据。

### 三、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一) 制度背景

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关键是要构建起以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为核心的发展体系,而实现



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前提是要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指国务院以清单形式明确在中国境内禁止或限制投资的行业、领域和业务, 各级地方政府依法实施具体管理。实施该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全国市场规则和监管规则的统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 能有效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协同作用。通过打破地方不合理限制和隐形壁垒, 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确保有效市场在要素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从而深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积极影响在于能够增加各多元经济主体公平进入市场的机会, 破除行政垄断和地方垄断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负面影响。

##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1.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企业员工雇佣规模的影响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以清单形式明确规定禁止或限制投资的行业范围, 对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或领域而言, 各类市场主体享有依法公平经营和进入的权力。该制度安排旨在通过减少政府政策干预和优化市场营商环境进而推动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在制度交易成本层面, 在政府未实施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前, 地方政府对市场的准入管制容易造成企业在经营中面临较高的制度交易成本, 而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能够通过精简市场准入环节的相关审批, 有效降低企业在市场进入中的制度交易成本。而制度交易成本的降低能够加快企业进入市场, 扩大企业的业务规模, 对企业员工的雇佣需求得到提升<sup>[19]</sup>。在企业资源配置优化方面,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在弱化政府干预、改善要素配置效率方面发挥作用, 优化了企业的资源配置, 引导企业资源向高附加值领域流动。企业资源配置的优化为企业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 进而能有效发挥稳就业的作用<sup>[20]</sup>。在市场竞争环境方面,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打破了市场的壁垒, 推动了包括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在内的多元市场主体在负面清单以外领域享有公平进入市场的权力。公平竞争的环境推动了企业活力和营业收入的提升, 增加了对企业员工雇佣规模的需求<sup>[21]</sup>。在企业创新能力方面,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通过赋予企业创新决策权, 推动了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而企业在受创新驱动后, 将更倾向于扩大生产数量, 扩大企业员工雇佣规模。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核心在于减少行政干预, 为企业创造自由的市场环境, 进而影响企业的雇佣决策。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实施能扩大企业员工雇佣规模。

### 2.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企业员工雇佣规模的作用机制

企业数字化转型即企业借助数字软件技术与数字硬件基础设施对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进行改造来推进数字化。首先是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作为市场竞争机制的重要手段, 能够有效打破地方壁垒和行政垄断, 进而加剧市场竞争。从企业管理视角看, 市场竞争机制可以提升企业管理决策效能、增强管理层激励效果、强化企业创业导向性, 进而显著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同时,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推行有助于激发企业技术升级动力, 而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促使企业通过创新获取发展优势。企业更倾向于引进以云计算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新技术, 而新技术的出现推动了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并有助于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sup>[22]</sup>。上述分析说明,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其次是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员工雇佣规模的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了就业的创造效应, 加快了新就业形态和新就业模式的出现, 进而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扩大了企业的员工雇佣规模。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就业存在创造效应的同时也存在破坏效应, 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就业的创造效应大于破坏效应, 促进了企业就业规模的增长<sup>[23]</sup>。这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扩大企业员工雇佣规模。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来扩大员工雇佣规模。

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即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总收入之比, 是衡量企业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首先是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传统审批流程的存在会导致企业在市场上面

临较高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则通过划定行业准入门槛,简化了企业进入市场的程序,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释放企业创新资源,进而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将得到显著提升<sup>[24]</sup>。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实施提升了行业的竞争程度,而充分的行业竞争能促使企业不断提升创新效率,以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sup>[25]</sup>。这说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能提升研发投入强度。其次是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员工雇佣规模的影响。在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提升的同时,研发活动本身也直接发挥了就业创造效应,企业根据研发投入强度的提升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高技能研发岗位的数量将显著增加。同时,研发技术创新能够促进生产规模的扩大,推动生产率的提高,带动企业对就业需求的增加。这表明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能扩大企业员工雇佣规模<sup>[26]</sup>。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通过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来扩大员工雇佣规模。

企业融资约束,即企业在寻求外部融资时,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出现外部融资成本高于企业内部融资成本的情况。首先是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实施给予企业更大的自主决定权,推动管理层在竞争压力下制定灵活的发展战略,提升企业治理透明度,降低信息不对称,进而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状况<sup>[27]</sup>。同时,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能有效促进企业资金的合理化配置,引导企业资金流向价值高的行业,从而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资金的合理化配置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融资机会,能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sup>[28]</sup>。其次是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对企业员工雇佣规模的影响。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能够推动企业获得稳定的外部融资,有助于企业长期雇佣员工,从而改善整体就业环境<sup>[29]</sup>。同时,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能够推动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并促进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而创新水平的提升使得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得到增加,进一步扩大员工雇佣规模<sup>[30]</sup>。这表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能扩大企业员工雇佣规模。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4: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扩大员工雇佣规模。

#### 四、研究设计

##### (一) 样本和数据

中国于2016年首次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试点,在2017年进行第二批试点,该制度自2018年12月起在全国范围实施。为确保研究数据的有效性,本文选择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以此规避长周期样本可能产生的数据偏差。为了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以及避免受极端值的影响,本文选择剔除样本期内被标记为ST和PT的年度样本企业,排除政策敏感性较高的金融类企业,删除关键指标缺失或存在异常值的观测值,并对连续型变量实施1%双侧缩尾处理,最终得到17 791个有效观测值企业样本。其中第一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试点的企业样本量为5 140;第二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试点的企业样本量为5 576。本文相关研究数据来源于深圳希施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CSMAR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和万得(WIND)数据库。

##### (二) 模型构建

各地以循序渐进的形式开始推进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相关试点,因此,为检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能否推动企业达成稳就业的目标。本文选取多期双重差分法(DID)进行估计,模型如式(1)所示:

$$Laborit = \beta_0 + \beta_1 Regulation_{it} + X'_{it}\beta_2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Laborit$  为企业  $i$  在  $t$  年的员工雇佣规模的对数值,用来衡量企业在稳就业层面如何体现就业吸纳能力;  $Regulation_{it}$  则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即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表示企业  $i$  所处的省份在  $t$  年是否处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试点地区;  $\beta_1$  则表示为该地区在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后对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实际影响效果;  $X'_{it}$  为本文的控制变量向量;  $\mu_i$  为企业的个体固定效应;  $\lambda_t$  为时间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t}$  为随机误差项。

为探究地区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对企业的员工雇佣规模存在何种作用机制, 本文参考已有文献<sup>[31]</sup>的做法构建模型, 具体见式 (2):

$$M_{it} = \beta_0 + \beta_1 Regulation_{it} + X'_{it} \beta_2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M_{it}$  为机制变量, 包括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研发投入强度、融资约束程度, 其他解释变量与式 (1) 相同。

### (三) 变量选取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雇佣规模 (*Labor*), 参考陈胜蓝等<sup>[32]</sup>关于稳就业的概念, 使用上市公司企业员工人数的对数值来衡量企业的就业吸纳能力。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Regulation*) 为二元变量, 依据企业注册所在地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实施状态进行赋值。当企业注册地所属省份属于第一批试点省份时, 在 2016 年及以后的 *Regulation* 变量赋值为 1; 当企业注册地所属省份属于第二批试点省份时, 在 2017 年及以后的 *Regulation* 变量赋值为 1; 在 2018 年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全面实施, 则 2018 年及以后的 *Regulation* 变量都赋值为 1; 其余情况的 *Regulation* 变量均赋值为 0。

本文设定如下控制变量: 资产负债率 (*lev*) 为年末总负债/总资产; 企业规模 (*size*) 取总资产对数; 盈利能力 (*Roa*) 为净利润/总资产; 企业年龄 (*Age*) 取成立年限对数; 成长性 (*Growth*) 以营业收入增长率衡量; 托宾 Q 值 (*TobinQ*) 为股票市值/总资产; 股权集中度 (*Top1*) 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表示; 两职合一 (*Dual*) 为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兼任。

本文设定如下机制变量: 企业数字化转型, 本文参考吴非等<sup>[33]</sup>关于企业数字化的测度, 使用 Python 软件检索在 A 股上市企业年度报告中的企业数字化特征词, 通过对企业数字化特征词频次汇总取对数得到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 (*Digital*)<sup>[33]</sup>; 企业研发投入强度, 本文以企业研发投入与营业总收入之比来作为企业研发投入强度 (*RD*) 的代理变量; 企业融资约束, 本文选择测算 FC 指数来表示企业融资约束, 当 FC 指数越大时, 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情况越严重。

### (四) 描述性统计

表 2 展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样本量为 17 791。核心解释变量为 *Regulation* 即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虚拟变量, 其均值为 0.401 5, 标准差为 0.490 2。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员工雇佣规模, 其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 7.844 7 和 1.262 3, 说明不同的就业吸纳能力仍存在较大差距。

表 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符号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企业雇佣规模	<i>Labor</i>	17 791	7.844 7	1.262 3	4.158 8	11.148 9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i>Regulation</i>	17 791	0.401 5	0.490 2	0	1
资产负债率	<i>lev</i>	17 791	0.435 1	0.203 8	0.031 8	0.934 3
企业规模	<i>size</i>	17 791	22.419 0	1.310 5	19.477 7	26.397 8
盈利能力	<i>Roa</i>	17 791	0.036 5	0.057 9	-0.577 8	0.212 6
企业年龄	<i>Age</i>	17 791	2.902 8	0.335 5	1.386 2	3.610 9
成长性	<i>Growth</i>	17 791	0.406 6	1.130 5	-0.925 7	12.455 1
托宾 Q 值	<i>TobinQ</i>	17 791	1.930 1	1.277 6	0.802 4	17.675 9
股权集中度	<i>Top1</i>	17 791	0.345 1	0.149 1	0.083 2	0.757 8
两职合一	<i>Dual</i>	17 791	0.235 1	0.424 1	0	1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作为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有效举措，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实施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为了检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能否推动企业发挥稳就业的作用，本文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展开分析。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3。结果显示，随着固定效应的逐步引入，代表该制度实施的 *Regulation* 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在考虑企业的个体差异影响后，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依旧为正向显著。如列（2）所示，当企业注册所在地省份在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后，企业的员工雇佣规模将提升 3.1 个百分点。说明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能有效提升企业就业吸纳能力，H1 得到了验证。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i>Regulation</i>	0.026 4 * (0.014 1)	0.030 8 ** (0.013 8)
<i>lev</i>	0.182 8 *** (0.032 9)	0.196 7 *** (0.033 4)
<i>size</i>	0.650 0 *** (0.007 6)	0.633 3 *** (0.008 3)
<i>Roa</i>	0.014 4 (0.064 0)	0.017 9 (0.064 1)
<i>Age</i>	0.010 0 (0.040 1)	0.178 4 *** (0.051 0)
<i>Growth</i>	0.031 7 *** (0.003 1)	0.025 1 *** (0.003 1)
<i>TobinQ</i>	0.023 2 *** (0.003 6)	0.021 0 *** (0.003 6)
<i>Top1</i>	0.149 7 *** (0.047 2)	0.185 4 *** (0.050 1)
<i>Dual</i>	0.005 1 (0.010 1)	0.002 6 (0.010 2)
个体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7 791	17 791
<i>R</i> <sup>2</sup>	0.428 1	0.428 8

注：\*、\*\* 和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至企业的稳健标准误。后表同。

（二）内生性分析

为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择采用工具变量进行估计。参考郭娟娟和徐乾宇<sup>[34]</sup> 的做法，以 2011 年各省份无偿献血量除以常住人口数量的对数值作为工具变量。相关回归结果（限于篇幅不再展



示)说明,一方面,推进负面清单制度需要对市场经济制度进行深化改革,而这对社会道德基础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各省份无偿献血量能够较好体现区域内的社会道德水平。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改革措施,在社会道德水平较高的区域试点可能性更大,说明工具变量与政策虚拟变量具有相关性。另一方面,社会道德水平对企业员工雇佣决策并不产生直接影响,满足外生性条件。

### (三) 稳健性检验

#### 1. 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采用与基准回归一致的企业层面聚类标准误,原因是企业是面临政策冲击的直接决策主体。同时,本文将置信水平设定在 95%。图 1 中的平行趋势检验结果显示,政策实施前的各期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处理组与对照组趋势保持一致,平行趋势检验通过。

#### 2. 安慰剂检验

为规避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可能带来的偏误,本文选择安慰剂检验,对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省份与年份进行随机分配,并对样本进行 500 次随机抽样。结果(限于篇幅不再相信展示)说明,随机抽样回归的系数结果与基准回归的系数存在较大差距,安慰剂检验通过。

#### 3. 倾向得分匹配

由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企业稳就业的影响可能并不完全是由政策所导致,可能存在样本自选择问题。因此,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采用核匹配的方法进行处理,并在处理后的样本基础上进行 DID 估计,结果见表 4。

#### 4. 替换被解释变量

鉴于董监高与普通员工的雇佣机制可能不同,本文将员工总数扣除董事、监事与高管人数后进行数字化处理,结果见表 4。

#### 5.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由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试点文件存在于 2017 年末和 2018 年末发布的情况,不排除政策实施可能存在滞后性。因此,本文将第一批试点赋值为 1,第二批试点赋值为 1,第三批试点赋值为 1 重新进行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4。

#### 6. 剔除直辖市

由于直辖市具有较高的行政等级和经济地位,在直辖市企业注册可能在政策优惠和员工雇佣层面具有一定优势,可能对研究结果造成误差。因此,本文选择剔除企业注册地在直辖市的样本,结果见表 4。

#### 7. 更换聚类标准误

由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发生在省份层面,为避免稳健标准误被严重误估情况的发生。本文在稳健性检验时选择将标准误聚类到省份层面,结果见表 4。

#### 8. 经典 DID 模型估计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可能在估计交叠双重差分模型时造成偏误问题<sup>[35]</sup>。因此,本文选择将 2016 年的第一批试点地区视作实验组,并将剔除 2017 年的第二批试点地区样本的企业视作对照组,进行经典 DID 模型估计。同时,本文也选择剔除首批试点地区样本,将第二批试点地区样本视作实验组,其余视作对照组,进行经典 DID 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4。

表 4 的结果说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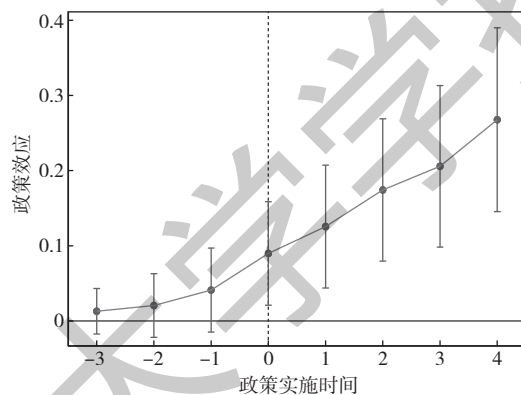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倾向得分匹配	替换被解释变量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剔除直辖市	更换聚类标准误	第一批试点样本	第二批试点样本
<i>Regulation</i>	0.029 4 *** (0.010 2)	0.023 5 ** (0.011 3)	0.028 3 ** (0.013 1)	0.037 6 ** (0.014 2)	0.030 8 ** (0.013 2)	0.041 2 ** (0.016 1)	0.037 2 ** (0.017 8)
控制变量/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7 281	17 790	17 791	15 686	17 791	12 224	11 576
<i>R</i> <sup>2</sup>	0.428 9	0.202 1	0.428 2	0.429 1	0.330 8	0.468 1	0.431 3

9.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为排除同期其他政策对企业雇佣规模的干扰，本文通过控制宽带中国试点、公共数据开放政策和增值税留抵退税改革等因素，准确识别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净影响。表 5 的结果表明，上述政策在实施时段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政策存在同期性，同时均能发挥稳就业的作用。

表 5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的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i>Regulation</i>	0.030 7 ** (0.013 6)	0.028 2 ** (0.013 5)	0.030 8 ** (0.013 3)	0.028 5 ** (0.013 8)
宽带中国政策	0.033 7 *** (0.011 1)			0.033 1 *** (0.011 1)
公共数据开放		0.010 7 (0.009 8)		0.009 1 (0.010 1)
增值税留抵退税			0.000 0 (0.001 0)	0.003 1 (0.011 0)
控制变量/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7 028	17 791	17 791	17 028
<i>R</i> <sup>2</sup>	0.432 9	0.428 9	0.428 8	0.432 9

(四) 机制分析

根据前文的结果可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能有效提升企业员工雇佣规模，但在作用机制层面仍有待深入探讨。依据前文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本文选取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企业融资约束作为机制变量进行检验。根据表 6 的结果可知，企业注册地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后，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并有效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这一结果验证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度、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企业融资约束这三条作用机制的成立。综上所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员工雇佣规模。H2、H3、H4 得到了验证。

表 6 机制分析结果

变量	<i>Digital</i>	<i>RD</i>	<i>FC</i>
<i>Regulation</i>	0.047 1 * (0.026 2)	0.005 1 *** (0.000 1)	-0.010 8 ** (0.004 8)

表6(续)

变量	Digital	RD	FC
控制变量/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7 810	14 163	17 173
$R^2$	0.343 9	0.052 2	0.134 6

### (五) 异质性分析

本文根据区域将样本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并进行异质性分析。东部地区企业具有更宽松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环境,能够较为容易地设立跨区域分支机构,同时,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支撑企业有效跨区域管理和实现规模化就业的关键。而中西部地区受限于经济基础薄弱的劣势,产业链不够完善和企业扩张能力有限,限制了企业的扩张能力和投资信心,政策实施难以有效落地。异质性分析结果(见表7)显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能提升东部地区企业员工雇佣规模,而对中西部地区企业员工雇佣规模的作用不显著。

本文还对行业内部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将样本分为高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高技术行业本身市场准入条件就相对宽松且雇佣决策依赖研发投入,市场准入清单政策的破除市场壁垒的边际效应相对较小。低技术行业劳动力依赖度较高,受地方垄断限制明显,市场准入放宽后企业倾向于扩大员工雇佣规模。异质性分析结果(见表7)显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能扩大低技术行业的员工雇佣规模,而对高技术行业的员工雇佣规模的作用不显著,且费舍尔组间系数差异均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

本文参考对企业要素依赖差异的分析,将在生产过程中更依赖劳动力投入的企业定义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将其余企业定义为非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需要固定资产投资与研发投入带来的技术升级结合,才能够实现资本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互补,避免低就业水平的扩张。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依赖劳动力,市场准入放宽后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员工雇佣具有即时且大规模的特征。非劳动密集型企业成本集中于设备投资,受市场准入放宽的影响相对较小。如异质性分析结果(见表7)所示,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能提升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员工雇佣规模,而对非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员工雇佣规模的作用不显著。

在企业产权异质性方面,国有企业具有承担政策性目标和公共服务职能的责任任务,其经营需要与国家政策导向保持一致。在政策放宽后,国有企业在政策上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在资金获取和项目机会上具有更多优势,从而更有机会扩大生产规模和员工雇佣。异质性分析(见表7)结果显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能够显著提升国有企业的员工雇佣规模,而对非国有企业的员工雇佣规模的作用不显著,且费舍尔组间系数差异均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

表7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地区		行业		劳动力投入		产权	
	东部	中西部	高技术行业	低技术行业	劳动密集型	非劳动密集型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i>Regulation</i>	0.029 1 *	0.013 8	0.013 8	0.059 6 **	0.049 3 ***	0.015 7	0.045 3 **	0.024 1
	(0.016 2)	(0.029 1)	(0.016 8)	(0.018 9)	(0.018 7)	(0.017 1)	(0.018 7)	(0.018 6)
组间系数检验	0.230 0 ***		0.393 0 ***		0.441 0 ***		0.321 0 ***	
	(0.000 0)		(0.001 0)		(0.000 0)		(0.002 0)	
控制变量/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1 958	5 833	8 542	9 249	7 846	9 945	7 557	9 336
$R^2$	0.398 8	0.483 6	0.528 2	0.357 2	0.429 2	0.464 1	0.348 2	0.463 4

## 六、结论与建议

作为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前提,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不仅是优化营商环境和破除地方壁垒的重要举措,更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稳就业的重要抓手。本文以2016年起逐步实施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为研究对象,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制度背景,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系统检验了该制度对企业稳就业影响的效应、作用机制及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第一,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员工雇佣规模,且政策效应具有稳健性。说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作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基础性制度安排,通过破除地方行政壁垒、减少行政干预、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有效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进而提升企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为实现稳就业目标提供了重要的市场化支撑。第二,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企业融资约束作为机制变量,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企业员工雇佣规模的影响中起到了机制作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分别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员工雇佣规模。三条路径相互补充、协同发力,完整揭示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从制度供给到企业雇佣决策的作用链条。第三,在异质性分析中,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能促进东部、低技术行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国有企业的企业员工雇佣规模,体现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稳就业效应存在异质性特征,在不同区域、行业与企业类型中呈现差异化表现。

根据以上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第一,进一步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发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稳就业的积极作用。根据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实际情况,建立负面清单动态更新机制。健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配套法律法规,提升制度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鼓励社会公众参与监督,破除地方的不合理限制与隐形壁垒,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在稳就业层面提供积极保障。建立市场准入政策的效果监测机制,定期追踪企业雇佣规模变化,结合企业反馈调整制度细节,强化市场准入制度对稳就业的促进作用。

第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与数字经济发展政策的协同作用,以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形式降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成本,激发技术升级动力,推动企业引入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强企业数字技术支持,提升企业的数字研发投入占比,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第三,强化对企业的金融支持。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对企业研发项目提供信贷支持,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提高企业资金配置效率,确保信贷资源向实体经济倾斜,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第四,推动不同区域、行业、企业均衡发展。鼓励东部地区继续深化改革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发挥东部地区的引领作用,形成可复制经验向中西部推广。中西部地区积极扩大政策覆盖面,完善地区产业链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关注低技术行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转型升级需求,以政策引导和技术支持为手段增强相关行业和企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升国资企业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强化稳就业的带头作用。支持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打破地方市场壁垒,创建公平和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激发民营企业的创造力和活力,培育就业的新增长点,弥补非国有企业稳就业效应不足的短板。

### 参考文献:

[1] 张韩,王雄元,张琳琅. 市场准入管制放松与供给侧去产能——基于负面清单制度试点的准自然实验[J]. 财经研究, 2021, 47(7): 93-107.



- [2] 陈邑早, 解纯慧, 王圣媛, 等. 放宽市场准入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J]. 科研管理, 2024, 45(12): 19-28.
- [3] 杨兴全, 程慧慧.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能否促进实体经济“脱虚返实”——实体企业金融化观察视角[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24, 44(10): 3-18.
- [4] 李玉婷, 黄建烨, 展望.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与企业人力资本升级[J].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 2024(2): 12-22.
- [5] 管照生, 詹宇波. 市场准入管制放松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准自然实验[J]. 产业经济评论, 2025(2): 62-79.
- [6] 陆菁, 韩涵, 杨阳.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稳就业效应: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27(3): 81-93.
- [7] 曾艺, 周小昶, 冯晨. 减税激励、供应链溢出与稳就业[J]. 管理世界, 2023, 39(7): 19-29.
- [8] 李勇刚, 王令, 藩篱破, 百业兴. 市场准入管制放松的就业效应研究[J]. 财经研究, 2025, 51(5): 110-124.
- [9] 林寿富, 谢艳晴.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劳动雇佣决策——基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5, 27(2): 46-62.
- [10] 李鹏, 金刚.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就业效应[J]. 经济学动态, 2025(1): 94-110.
- [11] 丁子家, 宁致远, 吴非. 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就业效应研究[J]. 华东经济管理, 2025, 39(7): 95-105.
- [12] 杨小伟, 张晓. 供应链金融的稳就业效应研究[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25(2): 82-97.
- [13] 刘志彪, 孔令池. 从分割走向整合: 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阻力与对策[J]. 中国工业经济, 2021(8): 20-36.
- [14] 李丹, 吕鑫萌. 全国统一大市场、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就业[J]. 经济体制改革, 2025(2): 38-46.
- [15] 白俊, 袁勋, 乔君. 放松市场准入管制与企业跨地区投资——基于负面清单制度试点的准自然实验[J]. 财经研究, 2024, 50(4): 64-78.
- [16] 张悦, 许永斌.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 财贸研究, 2023, 34(9): 85-95.
- [17] 衡芥荻, 肖土盛, 董启琛, 等. 放松市场准入管制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准自然实验[J]. 南开经济研究, 2025(3): 195-214.
- [18] 丁子家, 宁致远, 吴非. 市场准入管制对就业的影响——来自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经验证据[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5, 46(6): 82-102.
- [19] 张宽, 雷卓骏, 李后建. 市场准入管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来自负面清单的证据[J]. 世界经济, 2023, 46(5): 152-176.
- [20] 周志方, 韩尚杰, 程序. 市场准入管制放松与企业创新——基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试点的准自然实验[J]. 财经研究, 2023, 49(11): 125-139.
- [21] 孔祥利, 张倩.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引导规范民营经济发展的价值导向、制度安排与施策重点[J]. 南开经济研究, 2023(12): 65-80.
- [22] 曾皓. 市场竞争机制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基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准自然实验[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4, 46(3): 136-152.
- [23] 沈宏亮, 宋思萌, 李杰.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就业: 创造和破坏[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24, 39(11): 77-92.
- [24] 雷卓骏, 刘晔. 制度创新何以赋能区域创新: 来自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模式的证据[J]. 中国软科学, 2024(9): 113-123.
- [25] WANG Z C, TAO C Q, XU Y. Can higher marketization improve the level of entrepreneurship? -Evidence from China's negative list for market access[J].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 2025, 21(1): 40.
- [26] 钟坚, 冯峥. 数字技术创新的就业效应: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 现代经济探讨, 2024(11): 24-34.
- [27] 胡海川, 贾振婷, 冯丽丽. 市场准入管制放松与企业绿色转型——基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试点的准自然实验[J]. 经济问题, 2025(1): 79-90.
- [28] 贾昊阳, 李峻泽. 放宽市场准入与企业资金配置——基于负面清单制度的准自然实验[J]. 财务研究, 2023(3): 90-103.
- [29] 张三峰, 张伟. 融资约束、金融发展与企业雇佣——来自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J]. 金融研究, 2016(10): 111-126.
- [30] 文强, 陈海强, 袁煜玲. 缓解融资约束必然促进企业创新吗? 来自信贷扩张准实验的证据[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24, 44(9): 2779-2798.
- [31] 江艇. 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5): 100-120.
- [32] 陈胜蓝, 王鹏程, 马慧, 等. 《中小企业促进法》的稳就业效应——基于政府信用体系建设视角[J]. 管理世界, 2023, 39(9): 52-68.
- [33] 吴非, 胡慧芷, 林慧妍, 等.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2021, 37(7): 130-144.
- [34] 郭娟娟, 徐乾宇. 放松市场准入管制对中国企业供应链配置多元化的影响[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25, 45(3): 41-60.
- [35] GOODMAN-BACON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with variation in treatment timing[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21, 225(2): 254-277.

## The Impact of Market Access on Employment in the Context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ZHANG Hengrui, LV Kangyin, CHEN Si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7)

**Abstract:** Stabilizing employment is crucial to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eople's well-being.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market access negative list system, implemented since 2016, on the employment scale of enterprises in the context of constructing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The study uses the multi-period difference method and analyses data from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from 2011 to 2020.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rket access negative list system significantly expands the scale of employee recruitment by enterprises.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perates through three channels to promote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irst, the market access negative list system encourages enterprises to adopt new technologies and fosters a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thereby driv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creating new job opportunities. Second, by simplifying market access procedures and reducing transaction costs, the market access negative list system encourages enterprises to increase R&D investment, driving innovation-driven growth and creating more job opportunities, particularly for high-skilled labor. Third, the market access negative list system improves the external financing environment for enterprises, enabling them to invest in expansion and innovation, ultimately promoting employment growth.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impact of the negative list system for market access varies across regions, industries, and enterprise types, with more significant effects in eastern regions, low-tech industries, labor-intensive enterprises,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Deepening market integrat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tinue to adv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improve the negative list system for market access, and leverage its role in promoting stable employment. (2) Accelera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t should promote collaboration between enterprises,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to driv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reduce the cost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r businesses. (3) Strengthening financial support. It should improve financial services for enterprises, particularly financing support for R&D, develop inclusive finance, expand financing channels, and alleviate financing constraints for enterprises. (4) Promoting balanced development. It should formulate targeted policies to address regional development disparities,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dustries and enterprises, including addressing the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needs of low-tech industries and labor-intensive enterprises, deepen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s, while creating a fair and open market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for private enterprises.

**Keywords:** market access negative list system; employee hiring scale; stabilizing employment;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编校: 蒋 琰; 姚望春)